

试论社会性别定型的多维表征

刘 星

(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淮安 223001)

提 要: 社会性别定型作为一种在特定社会文化中形成的观念和认识, 不仅固定在语言定型中, 也表现在个体言语活动以及非言语活动中。本文在揭示社会性别定型在成语、谚语等语言单位中的固化表征的同时, 提出社会性别定型在交际中的动态表征, 结合具体实例, 系统论述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与社会性别定型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 社会性别定型; 语言; 静态表征; 交际; 动态表征

中图分类号: H353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定型本为社会学术语, 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学科间的相互渗透, 这一术语也被借鉴到民族学、文化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中来, 形成了诸多各有偏重的术语。社会性别定型(гендерные стереотипы)作为社会性别语言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是社会性别语言学研究 with 定型理论研究对接的产物。从本质上讲, 社会性别定型属于群体定型之一, 表示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群体典型特征及其行为和举止特点的概括性认识, 具体来说, 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这些特征在该群体每个成员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二是这些特征通过该群体成员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等不同表现形式体现出来。如同其他类型的定型一样, 社会性别定型不仅体现在语言中, 形成社会性别语言定型(гендерные стереотипы в языке), 也生动地体现在社会个体的行为包括非言语行为中。本文拟从静态和动态视角探究俄语社会性别定型在语言和交际中的不同表征形式, 同时辅以适当的俄汉语对比研究, 以期深化人们对社会性别定型概念的认识, 帮助人们更好地在跨文化, 尤其是跨性别的交际活动中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 实现有效交际。

2 语言中的社会性别定型及其静态表征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 社会性别定型并不是建立在生物学和生理学知识上的科学, “而是由历史形成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文化叙述和制度建构的结果。”(周民权等 2018: 108)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看, 一方面, 社会性别定型作为“一种文化的语言(языки культуры), 以其特有的方式记录着文化内容”(宋洪英 2011: 3), 反映着特定民族的性别文化特点, 能够帮助各性别主体在认识和接触异性之初, 缩短认知过程, 简化认知程序, 有效减少对对方言语的不确定而产生的焦虑感, 增加信心, 提高跨性别交际的质量和效果; 另一方面, 社会性别定型作为特定民族或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群体的固化认识和观念, 需要借助语言进行外化和实体化, 体现在语言中就形成了社会性别语言定型, 具体来讲, 指的是语言中反映出来的人们对男女两性适切行为的社会期望, 或者社会认定的更符合某一性别群体特征的总和。

俄罗斯学者 И. А. Гусейнова (2002: 57) 在谈到社会性别定型与语言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指出, 社会性别语言研究的内容只能通过分析语言结构才能展现出来, 这就意味着, 社会性别关系以受制于文化的定型形式被记载在语言中, 为言语行为和个人行为以及个人的语言社会化打上了烙印。可以说, 语言是表达社会性别定型的最主要手段: 在称名与男女相关的特定现象时, 语言同时也确定了一系列该社会男性或女性应该拥有的品质特征。(陈春红 2016: 80) 而且, 我们的许多认识定型都是通过学习、通过语言(文字)这种媒介习得的, 社会性别定型概莫能外。

每种社会文化都为男女两性预先设定了一系列相应的规范和评价, 对其行为进行限定。这些规范和评价在语言中以固定表达形式反映出来, 对于男性和女性表现出的行为模式的预期产生影响。例如, “Мужчина — глава семьи” (男人是一家之主); “Бабе дорога — от печи до порога” (女人的路只有火炉到门槛这么远, 意思是女人的活动范围有限, 成天只围着锅台、老公和孩子转); “Волос долог, а язык длинней” (女人的头发长, 而舌头更长, 喻指女性爱嚼舌头、扯闲话、搬弄是非) 等。不同文化中, 社会性别的定型和价值尺度不尽相同, 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亦表现各异, 但都被限定在严格的规定范围之内。这些规定作为体现男女行为规范的社会性别定型, 在集体意识里按照“对/不对”模式发挥功能。由于性别不同, 一个人的同一行为在不同文化中被赋予迥然各异的含义, 同一含义在行为上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 定型从中发挥行为纲领作用。(Денисова 2002: 67) 换句话讲, 社会性别定型作为众多定型概念之一, 亦具有鲜明的社会文化制约性。例如, А. В. Кирилина 在《俄语谚语中的女性声音》(1997: 25) 一文中, 通过对俄语谚语进行分析, 得出结论, 认为俄语语言意识中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具正面意义, “女性气质”不意味着较弱, 而是力量、决断力、承受力、耐力、慈爱、智慧和美丽。无论就外表, 还是内在品质, 俄罗斯女性都得到俄罗斯男性的高度评价。俄罗斯男性尽管具有独立、勇敢、积极、进取、好争、自信、身强体壮等正面的主流性别定型特征, 但他们常常被喜爱酗酒、缺乏责任心、懒懒散散等负面定型特征所掩盖, 给世人造成了俄罗斯社会“女强男弱”的印象。相比之下, 汉语中对中国女性的正面社会性别定型没有像俄罗斯女性那么高扬, 对中国男性的负面社会性别定型也没有像俄罗斯男性那么明显, 这都是受中国国情、民族文化、传统观念、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所致。(周民权 2014: 147—148)

此外, 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看, 社会性别定型还是一种转喻(метонимия)认知方式, 范畴及其特征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邻性、相似性基础之上, 用典型的性别气质可以指称相应的、具有性别特征的性别, 或者用性别范畴转喻其主要特征。同时, 作为语言现象的主要生产机制之一, 转喻以社会性别定型为基础, 促进社会性别词汇的生成。这些新词不仅反映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定型概念的互不对应, 而且体现了不同语言中对于新时代独立女性、事业女性、积极进取的女性和新型温柔男性的转喻或隐喻特点。(周民权等 2018: 11) 例如, 俄语中的“железная ледь” (铁娘子), “мужик в юбке” (女汉子), “тёплый мужчина” (暖男) 等, 与汉语中的“女强人”“铁人”¹“铁姑娘”²“奶嘴男”之类说法基本相同。而在“男色消费”时代, 男人的美貌也受到重视, “小鲜肉”一词多用于指称“性格单纯, 长相俊俏的男生”, 该词具有标记性, 从而成为新词。(陈春红 2016: 69) 例如, 我国海军游泳运动员宁泽涛在 2014 年仁川亚运会上曾获此称谓, 受到众多女粉丝的热捧。

概括地讲, 社会性别定型作为一种认识和观念, 是“从群体规范的视角对男女两性的言行进行约束, 既发挥社会监管的功能, 维护社会所认可的男女两性的行为规范, 也作为判断和命题的基础以及评价的特殊形式, 不断衍生新的具有制衡作用的社会规约。”(周民权等 2018: 4) 随着人类文明与社会的不断进步, 俄汉语中“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现象已经在悄然改变, 相应地, 便出现了一些倡导男女平等、褒奖女性与母性的成语, 反映了社会对女性地位及作用的认可, 如“Женщина — полнеба” (妇女能顶半边天), “Без женщины не

обойтись”（没有女性，一事无成），“Муж и жена — одна сатана”（夫唱妇随，同心协力）等。又如，民间还有一些带有戏谑意味的成语性说法，如俄语中有一句俗语“Муж — голова, а жена — шея. Куда шея повернёт, туда голова и смотрит.”（丈夫是脑袋，妻子是脖子。脖子往哪转，脑袋往哪看），指的是丈夫完全听命于妻子，妻子让干啥就干啥，妻子指向哪里，丈夫就冲向哪里，凸显出妻子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汉语中通常把那些“怕老婆”的男人称之为“妻管严”，与俄语“подкаблучник (под каблуком у жены)”（怕老婆的男人）完全一致，我国四川方言则称其为“耙耳朵”，另写作“火巴耳朵”，意思就是男人的一言一行基本上被老婆管着，对老婆言听计从，在家里没有话语权。

3 交际中的社会性别定型及其动态表征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社会中的个体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位置上，担当着一定的社会角色。（赵蓉晖 2003：199）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对男性和女性所赋予的角色期望是不同的。通常来讲，男性应当是有抱负的、独立精神强的、富有竞争性的，而女性则应当是依赖性强的、温柔的、软弱的；男性一般应当勇敢、坚强、富于冒险精神、统治欲强、适合做领导，女性则应是体贴的、顺服的、井井有条的、可爱的、情绪化的角色。（徐大真 2003：741—742）这种角色期望构成了相对固定的社会性别定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男女两性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并“通过群体压力、社会风尚和社会规范、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对人的行为包括言语行为起引导和制约作用。”（孙汝建 2010：214）众所周知，人类交际是言语交际与非言语交际的和谐统一。接下来，拟通过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分别系统阐述社会性别定型在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中的不同动态表征形式。

3.1 言语交际中的社会性别定型及其动态表征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性别定型作为一种特殊的定型形式，首先是一种认知，即特定社会或文化中男性和女性群体成员对自我和他人的认识，属于“集体意识的一种表现，存在于人脑意识中。”（宋洪英 2011：60）在现实交际中，社会性别定型通常以男女两性的思维定型和行为定型等形式表现出来。根据 В. А. Маслова（2001：110）的观点，思维定型又叫心智定型，是人的心智图像，是对事物或情景的固定的认识，它一方面与客观现实有关，另一方面与人类语言有关。至于行为定型，按照俄罗斯学者 В. В. Красных 的解释，指的是“以某种方式对社会群体、民族及民族文化具体的实际需要进行言语固化的符号”（Красных 2002：177），而在 В. А. Рыжков 看来，是指“通过对社会认可的需要进行表征，从而能够对个体意识施加类型化影响的民族交际单位。”（Рыжков 1985：15）这两种界说难免太过抽象和拗口。基于此，我国学者赵爱国提出，所谓行为定型，其实质无非是受民族文化制约的行为模式（модель действия）或行为策略和战略（тактика и стратегия действия）。（赵爱国 2006：132）

准确地讲，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行为定型是受社会定型制约的，个性只有在约定的社会定型范围内施行自己的行为。（赵爱国 2006：129）就本文研究的社会性别定型而言，女性受其影响和约束，通常在言语行为上比男性更礼貌、更委婉、更人性化。这些特征在语音、语法、词汇和语句等不同层面语言材料的选择以及语言使用的表现风格，包括话题的选择、话题量的大小、说话方式与交际策略等方面均有所体现。例如，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男性常常通过重叠、打断、反问、甚至沉默来控制会话转换，女性则比男性更注意遵守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对言语的礼貌有高度的要求，自觉地拒绝使用脏话粗话。（周民权 2014：43）又如在祈使句的使用上，女性多以“давайте”（让我们……），“можно ли”（能不能……），“пожалуйста”（请……）等委婉的方式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即便是命令别人，也习惯于使用礼貌语言，甚至在生气、郁闷时也不例外。

俄罗斯学者 Г. Е. Крейдлин 在其专著《非言语交际中的男性与女性》（2005：26—36）

中，对交际中的言语与非言语交际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较全面地总结出俄罗斯文化中迄今为止形成的最具代表性的12种社会性别交际定型。

(1) 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更高的交际敏感性（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由于女性在照顾家庭、生育和教育孩子等各个方面都担负着重要责任，因此更期待她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化程度、在交际过程中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说话人和谈话主题上、遵守交际礼节规范、具有一定的忍耐力。如果说较之于男性，女性更为情绪化的话，那么男性则更为理性。

(2) 男性的美德在于能言善辩，既体现于口头表达，又见诸身势动作展示，而女性的美德则在于同倾听直接相关的沉默（молчание）。例如，在文学作品、造型艺术品、戏剧剧本等各种形式的艺术文本中，气质高雅、端庄贤淑的女性大都是“保持沉默的”，嘴巴紧闭，一言不发。这样的女性形象表现出的是一种稳重、拘谨、谦逊、克己和沉思，尤其在绘画作品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3) 女性关注更多的是情境的心理方面，而男性则是认知方面。相较于男性，女性的交际行为更具情感表现力，情绪表达得也更为明显，如嚎啕大哭、大声尖叫、哈哈大笑等都十分常见。此外，女性更容易谅解他人不恰当的行为，使用一些有意和解的肢体动作。而男性则不能够“显露弱点”，要尽量避免多愁善感、滥用感情，不能在别人面前表现女人所特有的情感，如爱抚、柔情等。

(4) 女性的优势是下意识和直觉，而男性的优势是逻辑和理性。

(5) 较之于言语行为和对方（无论任何性别）的面部表情以及符号动作，女性比男性更为关注的是视觉代码（визуальный код），尽管她们在识别手势或者头部动作方面并不比男性强多少。

(6) 男性喜欢实用主义氛围（инструментальная сфера）、自我肯定、热衷于完成社会工作和认识外部世界，而女性则喜欢社会感性氛围（социоэмоциональная сфера），注重内心世界和交际的舒适性。关于这一点，И. А. Стернин（2002: 6）也曾提出类似的观点，男性似乎总是试图做点什么，而女性在不知道该做什么时，经常会对男性说“Ты же мужчина, придумай что-нибудь!”（你可是男人啊，快出个主意吧！）。

(7) 女性与他人交往的倾向性（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й настрой）在较大程度上是社会性的（或社会定向性的，социальн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й），很少表现出个性倾向性。究其原因在于，女性相比男性而言，社会地位偏低。通常情况下不论男女，越是被压迫，越具有强烈的社会动机，如想着爬得更高、想在社会上占据受尊重的、物质生活有保障的地位等。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女性在理解交际细节方面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这样一来，就很容易理解女秘书在领导面前的行为举止或者是女性在正式的招待会、宴会、展示会上的表现）。

(8) 较之于男性，女性较少表现出交际侵略性，更多的是耐性。

(9) 较之于男性，女性对非言语交际行为更为敏感，因为她们对交际另一方表现出更多的移情心理（如团结、同情、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等）。很显然，诸如“Я больше нервничаю (переживаю, тревожусь), если рядом нервничают.”（如果周围的人都很着急的话，那么我就会更加坐立不安），“Я так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а к настроению других, что...”（我非常能理解别人的这种感受……）之类的语句，多出于女性之口。通常来讲，了解他人的感受，能够帮助女性更轻松地解读对方的非言语信号。

(10) 谈话主题（тематика бесед）不同，女性谈论较多的是家庭、孩子、疾病（对健康状况关注较多）、具体的行为举止等，而男性谈论较多的是工作、体育、政治、军队、技术、汽车等。

(11) 女性表现出的压抑、郁闷状态比男性多，主要见诸非言语交际行为；男性抱怨较多的是工作中发生的不愉快事情，但很少抱怨健康和家庭矛盾等。

(12) 较之于男性，女性较少以缺乏知识或者能力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更多的解释理由是不走运、失利、命中注定、厄运等。

上述总结未必客观公正，但从总体上反映了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定型在言语交际中的动

态表征特点，与汉语中的相关表述极为相似。例如，国内英语学者贾玉新（1997：431—432）在总结西方学者相关观点的基础之上，结合汉语中男女两性所采取的不同交际方略和交际风格，分别归纳出男女两性各自不同的社会性别交际定型，其主要论点简要概括如下：

女性的社会性别交际定型主要表现在：（1）用言语建立和维系和谐关系；（2）通过展示自己（self-disclosure）与对方取得共识，善解人意；（3）用言语与对方建立平等关系，寻求共同点和一致性；（4）同情别人，将心比心，善于移情；（5）用语言或非语言行为支持别人讲话，注意倾听别人讲话；（6）包容他人（inclusive），以询问的方式参与会谈和争取发言机会；（7）以提问的方式使对方畅所欲言，常用“mm”“mm”“um”和“huh”“yes”或点头的形式对别人谈话表示感兴趣，很少打断别人谈话，不争夺发言权，使用各种方式支持别人把话讲完；（8）及时对别人讲话作出反应，以表示全神贯注听别人讲话；（9）常作出试探或建议性反应，以使对方能自由阐述自己的观点；（10）谈话的目的是为了维系和谐的关系，言谈琐碎，生动有趣，常常在枝节方面做文章。

男性的社会性别交际定型主要表现在：（1）用言语表明自己的权威和自信；（2）不轻易展示自己，以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3）用语言确定自己的主导地位 and 权势；（4）把自己与别人对比，设法引起别人的关注；（5）提出具体意见，帮助解决问题；（6）垄断发言权，善于从别人那里夺取发言权，及时表明自己的观点；（7）具有较强的独立精神，无需把发言权让给比人；（8）对别人讲话也及时反应，但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使别人逊色；（9）自信，果断，喜欢占有支配权；（10）谈话呈线性流动，目的明确，琐碎枝节会妨碍目标的实现。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尽管中俄两国的国情不同，文化观念各异，但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语言定型特点无论在言语目的、表述方式，还是在交际方略和交际风格方面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共性和男女两性的个性特点，体现了俄汉社会性别定型在言语行为总体特征方面的内在联系。（周民权等 2018：140）概括地讲，因受社会性别与角色定位的影响，女性具有情感型（expressive）的特征，而男性具有工具型（instrumental）的特征。女性交际一般是以建立和谐的关系为目的，因此会充分支持对方，愿意合作，注重情感交流；而男性交际主要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取得某项成就，对他们来说，交际是实现其目的的手段。（贾玉新 1997：433）毫无疑问，在真实语境的跨性别交际中，言语行为的社会性别定型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要求交际双方都必须具备“施行自我行为”和“理解、接受他人行为”的“知识和文化”储备。只有交际双方都具备了对他群体的这种“知识和文化”储备，具有对他群体的适应性，才会具有一定的跨性别文化交际能力，进而确保交际目的的达成。

3.2 非言语交际中的社会性别定型及其动态表征

作为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交际形式，非言语交际不同于言语交际，“它要借助于能够刺激人脑的感觉器官，主要是视觉的诸类符号，通过暗示、示意、模仿、象征、感染等表现方式，用来修饰、加强甚至代替言语的运用。”（李元授 1991：356）由于定型观念的不同，不仅不同的民族在表示同一概念时使用着不同的非言语交际符号，而且同一种非言语交际符号对于不同民族的人则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丁煌 1997：154）例如，有些中国人说话时习惯于“指指点点”（тыкать），既指自己，也可以指别人，指自己时往往用食指或拇指点点或指指自己的鼻子，但在指别人时不能指着鼻子，指大概方向即可，这在中国人看来没有什么不礼貌；但在俄罗斯人的概念中，用手指指人是不礼貌的，如俄语中的“показывать пальцем (на кого-н.)”意为“指指点点、公开品评、指摘、当众数落”。从指示这个角度说，俄罗斯人用头多于用手，如“кивать головой”（用头指）便是俄罗斯人特有的头部指示动作。

在人类世界，对于特定的民族和群体成员来说，他们一出生就面临着一个现存的、既定的文化世界，“这个世界的价值和意义，不仅通过强有力的宗教、政治、法律等文化制度强

加给他，而且还通过习俗、礼仪、教育等形式灌输给他，使他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

（司马云杰 1992：80）定型作为对特定民族或群体典型特征的概括性认识，它“寄存”在该民族（群体）成员的头脑中，决定了其只能按照一定的规则在特定的框架内做人、做事和看待世界，其中包括对非言语交际符号的使用。俄罗斯学者 Т. Б. Щепанская（1991：28）也曾提出类似的观点，即定型具有符号性质，可以将其作为符号对象进行研究，用符号中规定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但需要补充的是，定型不一定是通过口头表达出来的。也就是说，定型具有非语言性质，作为一种首先发生在思维层面的心智定型，除借助有声语言外，还可以通过其他非口头的符号代码（如身势语、目光语等）表达出来。

无独有偶，我国学者彭文钊和赵亮在其合著的《语言文化学》（2006：89）一书中也曾对此展开详细论述，并提出定型是一种心智现象，存在于意识中，制约着人们在特定情境下的言语和行为。它具有可言语化特点，但这并非定型的必要特征，也就是说，可言语化但不一定言语化……例如，根据 А. В. Сергеева（2006：81—83）的观察和研究，俄罗斯人有一种集体取向（*установка на коллективность*），因此总是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和看法，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想：“别人会说什么或别人会怎么想？”这种思维定型使他们在行为上也表现出相应的行为定型。因此，在公共场合，俄罗斯人的举止总是显得彬彬有礼，殷勤周到，“男人们通常会主动给女士开门、帮她们拿重物、给她们让座、扶她们上下车，男士与女士同行时需要挽着女伴的胳膊（*гулять/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под руку*），这已经成为一种行为定型”（宋洪英 2011：85），更准确地讲，是一种非言语行为定型。

社会性别定型作为一种特殊的定型类型，是社会为不同性别的人们所分别限定的所思、所为、所言、所觉的范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并‘强制’该社会的个体模仿和传播。”（宋洪英 2012：72）例如，在中国正统文化的传承当中，“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是被古人所称道的，现在更多地要求男女两性“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且美态标准不尽相同：男子当以刚劲、壮美、力度取胜；女子则以轻盈、典雅、柔性为美。所以站着“亭亭玉立”，走路“芊芊细步”，讲话“莺声燕语”，看人“秋波微转”的“窈窕淑女”这才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董珍兰 2006：23）显然，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动作更显平和、柔媚、多姿，这无疑与社会建构的男性气质及女性气质相符，也反映了社会对于男女两性的不同审美要求。因此，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一个男性如果扭捏作态，说话嗲声嗲气，或者做事优柔寡断，缺乏果断，会斥之为“娘们儿”“不像爷们儿”“缺乏男子汉气质”等；而一个女性如果风风火火，胆大妄为，行事泼辣，是有失风雅的事，会称其为“女汉子”“假小子”“没有女人味”“像个男人”等。究其原因，是这些男性和女性的言行背离了其典型性别特征，与人们所期待的社会性别定型不符。

在俄罗斯，男性和女性分别被赋予不同的形象和角色定位，社会性别定型的区别折射在非言语交际中，使得两性的言谈举止在具有某些共有特征之外，也形成了其各自的特色。一般来讲，“女性倾向于通过动作行为尽可能表现出自己性格和情感上的柔媚特征以及性别上的优雅气质”（周民权等 2018：398），而男性则希望自己的动作行为能够体现出具有男子气概的附加色彩或者和男子气概有联想关系。实际上，有些社会性别定型差异可以借助于人的心理和生理特征进行解释。以副语言为例，较之男性的发音，女性发音的特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音质清晰、元音音色丰富、音长较长、音域宽、音高值大、音调变化较多等。（赵蓉晖 2002：23）其中，“音域宽”“音高值大”等都是来源于自然差异的社会性别定型特征。要知道，从生理角度看，两性在发音器官上具有天然的差异——与男子相比，女子的声带短且薄，松弛度较小，肺活量也较小。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他们在音高和音域方面的一系列差异，而且对语调差异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又如，上文中提到的“女性比男性更关注视觉代码，对非口头交际行为更为敏感，对交际另一方表现出更多的移情心理……女性关注更多的是语境的心理方面，其优势是下意识和知觉，而男性关注更多的是语境的认知方面，其

优势是逻辑和理性”等与心理因素有关的社会性别定型差异，无一例外都是俄语社会性别定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性别定型在非言语活动中的表现形式。

关于社会性别非言语行为定型，俄语中与之对应的术语有“невербальные гендерные стереотипы”（Крейдлин 2003），“невербальные гендерные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е стереотипы”（Крейдлин 2005），“гендерные стереотипы невербального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Ермолаева 2009）等。严格来讲，一个民族的性别文化是受该民族的传统习俗、社会规约等因素影响的，各性别主体在其社会化过程中逐渐习得自己本民族的性别文化，“并将这种文化内化到他的行为认知体系中，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不断复现”（宋洪英 2011：161），成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社会性别言语和非言语行为定型。例如，在俄罗斯，“吻”（целовать/поцелуй）作为一种表达亲密的方式，是男女之间见面打招呼时较常使用的动作行为，其中以“целовать руки”（吻手）或者“приложиться к руке”（将嘴唇贴在手上）最具代表性。“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将双唇轻触手背”，这是俄罗斯男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问候。但是在中国，除了恋人、夫妻之间，很少见到“男性吻女性的手”这一见面问候动作，“不仅是受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礼仪的影响，而且源于东方男女两性的羞涩与矜持，男性不好意思这样做，羞于吻女性的手，女性也会感到不习惯、不自然，难以接受这一见面问候礼节，在公共场合尤其如此。”（周民权等 2018：417）试比较：

[1][Степан:] Прошу извинить... я только проститься, Касьяновна. (Целую руки.) Будь тут здорова и весела. (Л. Леонов, Метель)

[斯捷潘:] 请原谅……我很抱歉，卡西娅诺夫娜。（吻了吻她的手。）祝你健康快乐！

[2]— Я не помешала? — спросила Ни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 Напротив! — воскликнул плановик и приложился сухими губами к руке Нины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ы. — Если бы вы знали, как вас обожает Людмила! (В. Липатов, Повесть без начала, сюжета и конца)

“我不碍事吧？”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问道。

“恰恰相反！”计划工作人员喊了一声，将干巴巴的嘴唇贴在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手上。“您简直不知道柳德米拉把您崇拜成什么样！”

[3]路凯颤抖抖地抓住马越的手，……突然拿着这只手贴在自己的脸上、嘴上！（蒋子龙，《弧光》）

在例句[1]和例句[2]中，“целовать руки”（吻手）和“приложиться к руке”（将嘴唇贴在手上）尽管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但从使用者方面看，都是由男性（Степан 和 плановик）完成的，用于表达对女性交际者（Касьяновна 和 Ни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的“问候”之意，而且与口头表达的话语相辅相成，成为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手段相互融合的语用实例；而在例句[3]中，陆凯和马越本是师生加同志关系，而且马越已婚，但马越根据“陆凯抓住她的手，并将手贴在脸上、嘴上”这一行为，判断其对自己产生了爱情（事实亦是如此），可见汉语中的“吻手”有较明显的标志爱情的作用。（刘星 2022：67—68）

4 结束语

社会性别定型作为特定民族文化共同体内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成员的身份标记，在语言和交际中具有各自不同的表征形式。其中，社会性别语言定型是社会性别定型在语言层面的投射和实体化，是对社会性别定型所反映的现实世界片断（即男性和女性群体）的固化表征，即社会性别定型的语言化。而社会性别言语和非言语行为定型则是社会性别定型在言语和非言语活动（行为）中的动态体现，是思维认识定型的直接外现，两者互为依托。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由于民族习性、文化理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不尽相同，社会性别非言语行为定型表现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必须尽其所知和所能兼顾到对方的性别文化规则和思维方式，及时根据交际需要调整自己的交际策略，方能缓解冲突。

附注

- 1 铁人——源自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
- 2 铁姑娘——源自 20 世纪 60—70 年代农村或城乡生产部门曾涌现的“铁姑娘队”。

参考文献

- [1]Гусейнова И. А. О некоторых форма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гендерного аспекта в 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дескриптивных рекламных текстах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журнальной прессы России и ФРГ) [A]. Гендер как интрига познания: Гендерные исслед. в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и и теори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C]. Москва: Пилотный выпуск., 2002.
- [2]Денисова А. А. Словарь гендерных терминов[Z]. Москва: Информация-XXI век, 2002.
- [3]Кирилина А. В. Женский голос в русской паремииологии[J]. Женщин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1997(3).
- [4]Красных В. В. Этнопсихолитвистика и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M]. Москва: Тнозис, 2002.
- [5]Крейдли Г. Е. Мужчины и женщины в невербальн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5.
- [6]Маслова В. А.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 2001.
- [7]Рыжков В. А. Регуля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 стереотипов[A]. Знаковые проблемы письменн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Межвуз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C]. Куйбышев: Пединститут, 1985.
- [8]Сергеева А. В. Русские стереотипы поведения, традиции, ментальность: 4-е изд., испр.[M]. Москва: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6.
- [9]Стернин И. А. Общение с мужчинами и женщинами[M]. Воронеж: Наука, 2002.
- [10]Щепанская Т. Б. Женщина, группа, символ (на материалах молодежной субкультуры)[A]. Этнические стереотипы мужского и женск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C]. СПб.: Наука, 1991.
- [11]陈春红. 俄语成语中的女性社会性别定型语用研究[D]. 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6.
- [12]丁 煌. 交际信息学[M].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7.
- [13]董珍兰. 汉语体态成语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14]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15]李元授. 交际学[M]. 武汉: 武汉测绘大学出版社, 1991.
- [16]刘 星. 社会性别定型视阈下的俄汉身势语对比研究[J]. 现代语文, 2022 (10).
- [17]彭文钊, 赵 亮. 语言文化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18]司马云杰. 文化价值论——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 [19]宋洪英. 语言文化学视野下的定型研究[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
- [20]宋洪英. 从模因论看民族文化定型[J]. 外语学刊, 2012 (1).
- [21]孙汝建. 汉语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差异[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
- [22]徐大真. 性别刻板印象之性别效应研究[J]. 心理科学, 2003(4).
- [23]赵爱国. 语言文化学论纲[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 [24]赵蓉晖. 俄语语音中的若干性别差异[J]. 中国俄语教学, 2002(3).
- [25]赵蓉晖. 语言与性别——口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 [26]周民权. 俄汉社会性别语言的语用对比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27]周民权, 周 薇, 陈春红. 社会性别定型的俄汉语用对比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Multi-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 of Gender Stereotypes

Liu Xing

(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an, Jiangsu Province 223001, China)

Abstract: Gender stereotypes, as a concept and understanding formed in a specific social culture, is not only fixed in language stereotypes, but also manifested in individual verbal activities as well as nonverbal activities. While revealing the solidified representation of gender stereotypes in linguistic units such as idioms and proverb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gender stereotypes in communic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gender stereotypes based on specific examples.

Key words: gender stereotypes; language; static representation; communication; dynamic representation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省“双创博士”人才项目（JSSCBS20221468）；淮阴工院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会性别定型视阈下的俄汉非言语交际对比研究”（22HGS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星（1988—），女，山东临沂人，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俄语语用学，社会性别语言学。

收稿日期: 2023-03-28

[责任编辑: 李 侠]